

读文学翻译家杨苡口述自传《一百年,许多人,许多事》——

走过百年,她举重若轻叙述时代

本报记者 严粒粒

编者按:法国学者菲利普·勒热讷认为:原则上,一个人只会死一次,他只能写一部自传……当人开始写自己的生活时,他知道他将给此前的过去生活中一切说不定、拿不稳的东西赋予一种最终的形式和意义。

本期阅读推荐两部口述自传,分别来自文学翻译家杨苡和文艺学泰斗童庆炳。他们在同样抵达学界高峰之前,一个是富家大小姐,一个是生来贫苦的少年,两条丰富的人生之路如此迥然不同,却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启迪。

而今,杨苡和童庆炳都已经去世。他们彻彻底底地成为历史人物,但他们的人格魅力通过自传仍然在闪光。如果本周阅读版,能有幸成为一个大家认识杨苡和童庆炳的引子,那么也就达到它的使命了。

在讲述西南联大的纪录片《九零后》中,百岁的杨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“最欣赏的男的当然是我哥哥”。而这不妨碍她拿杨宪益“开涮”。

杨宪益,有人说他是“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”。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,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(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汉学荣誉学位的女生,英籍)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,包括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、唐宋诗文、传奇、元曲、明清话本、诗文、《史记》《聊斋》等古典文学名著,鲁迅、沈从文、丁玲等当代作家的作品,以及《芙蓉镇》《沉重的翅膀》《绿化树》等大量的现代作品,总共不下200种。

这样一个译林泰斗,杨苡“吐槽”是一个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“小皇帝”,“什么都不会”。

杨家是典型旧式大家族。杨宪益大杨苡五岁,是家族的长子长孙、唯一的男丁,从小备受宠爱,以至于杨苡都觉得“挺可笑”的。

年幼时,她见识过排场:早上起床,两个佣人在边上给杨宪益端洗脸盆、拧毛巾、接漱口水、帮穿衣裤,再在帘子外边候着他蹲痰盂;穿鞋他也是两脚一伸,鞋带佣人在佣人系,佣人不在杨苡或者姐姐杨敏如系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杨苡请吃饭,剥好螃蟹肉递给他时,他吃惊地问:“你怎么会的?”

被上上下下捧在手心,杨宪益的生活也就不好玩了。母亲不让他游泳,怕他淹死;不让他上学,怕他被绑架;不让他在外边打篮球,怕他磕碰,干脆买了个篮球架设在院子里,还要求一起玩的四哥、五哥传球不能扔,得走过来递给他。“老被管,又没人玩”,杨苡也替哥哥憋屈。她向来是要“好玩”的。

之后,杨宪益去了牛津大学读书,认识了同学戴乃迭,冲破新文化冲击下的封建思想坚持和她结了婚,把母亲都吓病了。晚年,儿时“小皇帝”像哄孩子那样照顾得病妻子的饮食起居,妻子去世后他就再也不翻译了。

爱情的力量怎么就翻转了杨宪益?这是另一个故事了。详情会不会

在杨苡女儿赵衡写的《我的舅舅杨宪益》里?

“追星”是另一件好玩的事。

在杨苡的生活里,大小姐的时髦消遣,除了上家政课(教学穿衣搭配、做蛋糕和冰淇淋之类把女孩培养成淑女、太太的课程)、吃西餐、学踢踏舞和画画,当然还包括看话剧、看电影。在天津,头等影院在英租界,新片第一轮在英租界放,法租界只能放第二轮。

杨苡最喜欢的好莱坞明星是瑙玛·希拉,一冲动给她写了封英文长信。信里表达了一个少女热烈又理智的仰慕。她说,“我爱我的国家,好莱坞电影里出现的中国人常常是丑化的,而她从不演辱华的电影”。没想到,大明星回信了,寄来了亲笔签名的六寸照片。

把“星”追成了挚友,放在哪个年代都令人惊奇。

17岁开始,杨苡和巴金通信。巴金大杨苡十五岁,那时已经出名了。在新文学作家中,杨宪益喜欢胡适,杨敏如喜欢冰心,杨苡最崇拜巴金。她爱读巴金,因为觉得自己家和《家》里描述的太像了,而她自己就是高觉慧——一个受“五四”新思想影响的青年,最后义无反顾地从封建大家庭出走的“幼稚而大胆的叛徒”(最后迫于时局,她确实“出走”到了西南联大)。

杨苡在信里表达了想法,巴金回信明确表示不赞成,说她年纪太小,首先应该把书读好。

在来往的信函中,巴金和杨苡从“偶像和迷妹”的关系,渐渐处出了坚固友谊。杨苡的闺蜜陈蕴珍的另一个名字叫“萧珊”,后来成为了巴金的妻子。也正是巴金的介绍,杨苡认识了巴金的三哥李尧林,也就是书里反复出现的“大李先生”。

书里,杨苡几乎没有表达爱情,如果硬说有痕迹,她对“大李先生”的回忆算是了。那些朦朦胧胧、忐忑忐忑,都是和眼下这个直来直去、讲求效率的时代不一样的相处模式和内心独白。

此外,在西南联大的时候,杨苡和穆旦的关系也有些微妙。穆旦和赵瑞

蕤是同时认识杨苡的,给杨苡写过一封“半真半假的信”,说两人“more than friendship,less than love”(友达以上,恋人未满)。后来,晚年老同学相聚,杨苡还不太敢约在家里,怕万一聊到穆旦,丈夫赵瑞蕤误会。

而关于赵瑞蕤,除了学习很用功之外,杨苡似乎没留下什么正面的评语,并抖出了一些可以说是“荒唐”又莫名有趣的事情。这里就不细说了。

自传里的许多故事很私密。用今天的话说,一传开就是“吃瓜吃到自己家”。不过,杨苡的讲述并无语焉不详。品读字里行间的语气措辞,她哪里是个世纪老人,完全是个不经世事、坦率真诚的少女。

还有一些大名人私下的可爱也“好玩”。

西南联大求学期间,有一阵,杨苡和沈从文、郑颖荪、杨振声,还有刺杀孙传芳的“侠女”施剑翘是邻居。有天,杨苡和朋友说话声音太大,被正在工作的朱自清和沈从文批评了一顿。后来她去道歉,就看见朱自清绷着脸,也不理她。从此,敦厚温和的朱自清竟在杨苡那儿的印象就“不大好”了。

杨苡更亲近沈从文,也交流得更多。学习上的许多抉择,包括读外文系,都是沈从文的建议。她记得,杨敏如和他“八卦”过沈从文的“社恐”。“一次座谈,轮到沈从文讲话了,他半天不开口,好不容易开口了,说:‘我不会讲话。我害羞。’而后又不响了……名作家呀,怎么会是这样?!”这感觉,可能就和现在哪个中学生要是读了《从文自传》会诧异“一代文豪怎么小时候天天逃课”差不多。

杨苡还发现“沈从文挺容易哭的”。在一次讨论跑警报不该跑之后,杨振声和沈从文就闹了别扭。那次,沈从文是批评跑警报的,“整天跑警报,开不了学,书也不念了,成什么事”;杨振声说,“你可以不跑,我拖家带口,孩子还小,不跑等着日本飞机炸死?”沈从文不说话,然后就哭了。他哭什么呢?尽在不言中。

此外,沈从文还和她“科普”了徐

芳,一个不在百度百科词条里的“好漂亮”“也抽烟”的“大女诗人”。她嫁给徐培根(“左联五烈士”之一殷夫的哥哥)之后,就淡出文坛了。网上现在能轻易搜到的只剩下“北大才女倒追导师胡适被拒”的故事,导致人们对徐芳的认知有局限。近年来有学者挖掘发现,她的诗不只为小情小爱,也有歌颂生活、爱国爱民的精神之歌。

名人轶事是名人自传吸引人的因素之一,是“甜瓜”。还有不少“苦瓜”吃起来很不是滋味。杨苡回忆了身边的下人、闺蜜、同学,以及亲戚。无论穷人还是富人,好人还是恶人,男人还是女人,时代确实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烙印。那是社会、人性和命运共同奏响的悲歌之歌。

总的来说,杨苡的自传有几分“他传”的意思。这也符合杨苡对完成口述实录的期待,不是希望总结自己,而是源于“对人与事的怀念”,对“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际”的念念不忘。

也许正因为传递出“普遍的人生的回声”,读者更能产生共鸣,杨苡也被她所筛选的记忆烘托起更完整的形象。

自传的结尾,停在1946年,抗战胜利一年后的一个下午。杨苡从重庆随中央大学乘船北返南京。

下船时候她想,“船上的日子结束了,流亡的日子总算结束了,生活该安定下来了吧?”

全书在这个问句中戛然而止。

《一百年,许多人,许多事》只是《杨苡口述自传》的上半部“上学记”。下半部“上班记”将在近年出版。按照时间表,到了南京之后,她进入了国立编译馆从事翻译工作。杨苡的后半段人生,将经历解放战争,新中国成立、文化大革命,以及《呼啸山庄》等等经典译作诞生等大事。

一场大历史剧里,还会有什么“无关宏旨”的细枝末节呢?

时代有时代的解答,杨苡也有杨苡的看法。我们等着看呢;接下来的大时代,将如何被一个浪漫又智慧的老人举重若轻。



《流水辞》

周华诚 著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该书以文化散文的笔法,讲述了浙南古老廊桥的古今故事。作者历时两年多寻访泰顺廊桥,充分挖掘和体验廊桥古今故事,在造桥人、守桥人、说桥人、访桥人、桥乡人等不同角度的切换中,描绘了文物、交通、民俗、技艺、宗教等不同维度的廊桥。



《如朕亲临》

黄博 著
山西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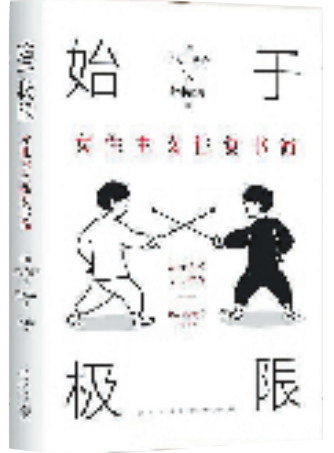
该书是一部有关宋代政治史和艺术史的通识读物,兼具学术严谨性与阅读趣味性。作者围绕宋代帝王肖像的史实与逸事,看图说话,分析考辨,绘制出一幅别致的宋代政治生活画卷,为宋代政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


《少年奔跑在田间》

陈伟军 著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这是一部以“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”为主题、聚焦青少年“劳动教育”的儿童文学作品。故事讲述考试成绩优异、却以为“花生挂在高高的树上”的城市少年,为了劝说回乡姐姐回城只身来到乡下,在劳动的过程中,感受了乡村的巨变和奋进的精神。



《始于极限》

[日]上野千鹤子 铃木凉美 著
新星出版社

这是日本著名学者与80后人气作家历时一年的书信集。中文译本出版后,讨论热度一直居高不下。从不同视角出发,两位作者围绕女性的恋爱、婚姻、母女关系、工作、独立、自由等十二个话题,展开了一场通往理解与改变的对话。



《一百年,许多人,许多事》书封。译林出版社供图。

《一百年,许多人,许多事》腰封上的那句“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”是引导我们读下去的起点。

“五四运动”同龄人,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,首创《呼啸山庄》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翻译家。几个“定语”前面一挂,杨苡人生的厚重感不言而喻。

不过,杨苡似乎并没有想展示她的“厚重”,或许因为在动荡的年代,和其他人相比,她家出名门,生活相对平稳,经历实在不具有戏剧性——就像一个普通人在碎碎念话家常——即便活在这些家常里的人,有名如巴金、沈从文、吴宓、杨宪益、赵瑞蕤、穆旦等大师。

所以,从某种意义上,全书倒像一部时代的“八卦”,尽是构成大喜大悲的细枝末节,无关宏旨。

这并不是一种轻佻的、不负责任的断定。至少,书的撰写者徐斌在交流中的确发现,杨苡“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‘好玩’,‘好玩’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”,也颐养了她一生通达乐观、浪漫天真的处世态度。有趣的人,通常也热爱生活。

那就从“好玩”说起。



《朴》书封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供图。

童庆炳是谁?单听这个名字还不够响亮。得再报上他的学生们的大名。莫言、余华、刘震云、迟子建、毕淑敏……他们都曾经在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研究生班学习。童庆炳是文学导师、总辅导员。

《朴》是童庆炳的自传。他的生命轨迹实际上也是那个年代,一批知识分子的成长之旅。那滋味,先是苦苦的,涩涩的,最后才有回甘,越嚼越有嚼头。

从贫农的儿子到大学教授,童庆炳的一生绝对是一出低开高走的励志剧。在今天,他的经历依然有普适价值。因为生活一直都是最好的老师,即

读文学理论家、作家童庆炳口述自传《朴》——

先苦后甜,他从苦涩生活里找“甜头”

本报记者 严粒粒

使她的出场并不温柔。

在童庆炳的童年记忆里,贫穷是件可怕的事情。他小时候的理想,就是每天能让家里老少七口人有五斤米下锅。家里没米了,父母也没勇气去亲戚朋友家借了,就在一顿大吵之后派童庆炳去借。“由于总是做这样难堪的事,痛苦就像瘟疫”,在他的心灵深处传染开,“终日都是无精打采”。

因为贫穷,童庆炳很早就从事体力劳动,去地里插秧、割稻、除草、挑水、放牛、挑柴。尤其是挑柴,道很难走,紧靠悬崖,山高路陡,许多人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。他十三岁时,就背着90斤的柴走这样的路。

今天有个热词是“劳动教育”。那些年的挑柴劳动让童庆炳明白,天上不会掉馅饼,想获得成功,就要有坚定、坚持、坚韧的不倦精神才能把“柴”带回家。

也因为贫穷,是祖母拿出棺材板的钱,童庆炳才没有中途辍学。后来他去读北京师范大学的时候(国家负担学费),家里除了母亲每年寄来精心缝制的两双布鞋,再也没别的东西给他。头三年里,他只有一床小席子没有褥子。被子是旧的,不御寒,只能用麻绳把靠近脚的地方绑起来,变成睡袋。枕头是自制的,一张布裹着“各种各样破东西”。布鞋就算抵着穿,也免不了新的还没寄来,旧的就提早穿底,得找旧报纸叠好塞到脚后跟。

可贵的是,童庆炳从来不埋怨生活。相反,面对现实的贫寒,他选择看到馈赠——挑柴精神、母亲和祖母的爱,以及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。

他由衷地在书里这样感叹:

“读书长见识,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。我开始隐约意识到,不读书就没有文化。不读书,你的思想是贫乏的,见识是狭窄的,无外乎就是周围亲眼看到的这些有限的现实;只有书本才能给你提供想象,提供新的知识,让你看到新的世界,让你知道,在你之前有很长很长的历史,在你之后还会有很长很长的历史,我们应该知道这些。知识真的是一种力量,它会催促你前行。我常常站在大门边上,望着重重叠叠的远山,想象书中描写的远方的草原、平原和海洋……”

在书的后半段,童庆炳已经很少提及“苦”了。他更看重对比下的各种“甜”。

比如,读大学时因为课程安排不紧,而拥有大量泡在图书馆读课外书时间的“甜”;初为人师时因为教学效果太差被挤出文学理论教研室,成了社科处一个喝茶看报的小科员后,从此更认真琢磨如何提高教学水平的“甜”(书中有一节“我的老师们”章节,专门回忆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资力量强大的阵容;战争时期被派去越南教中文跑警报时,在防空壕里和学生们近距离“你问我答”的“甜”……

没有背景故事的大道理是缺乏说服度的。但只要看了书,读者可以理解童庆炳为什么能从“苦”中提炼“甜”的。

口述中的童庆炳情感充沛,故事细节丰富,就有让人情感共鸣到又掉眼泪,又竖大拇指的本事。

这本书,也是他追求文学体验理论

的一次自我实践。

童庆炳是文学理论家,也是很好的作家。他说,文学也好,艺术也好,靠的就是体验而非经验。生活就是他的文学体验。

今天,仍然有许多小说、电视剧、电影之类的文艺创作被诟病不接地气。恐怕,创作者们都该听听童庆炳的“创作美学”。他所秉定的思路会让人联想到一代人的枕边书——作家创作札记《金蔷薇》。作者帕乌斯托夫斯基也认为,没有生活经验,写作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。

当年,童庆炳就是这么教育莫言的——

上世纪80年代,童庆炳提议把鲁迅文学院变成一所正规学校。虽最后未能成行,在他向教育部打报告后,国家同意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研究生班,给没有学历的“野路子”年轻作家提供系统学习文学创作的机会。

来报名的作家中,余华是高中毕业,毕淑敏是初中毕业。莫言学历更低,30多岁了,初中还没毕业,当时已经发表了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《红高粱》。童庆炳评价莫言的硕士毕业论文写得非常精彩,讲的是创作和故乡的关系。

莫言和故乡高密是相互互成就的。但童庆炳了解到,在写作生涯的最初,莫言不想写故乡,“因为写故乡就要写那个地方的贫穷,写那个地方的落后”。

许多年前,莫言去参军,在军营里开始写作,写海洋、写军舰、写海军生活

